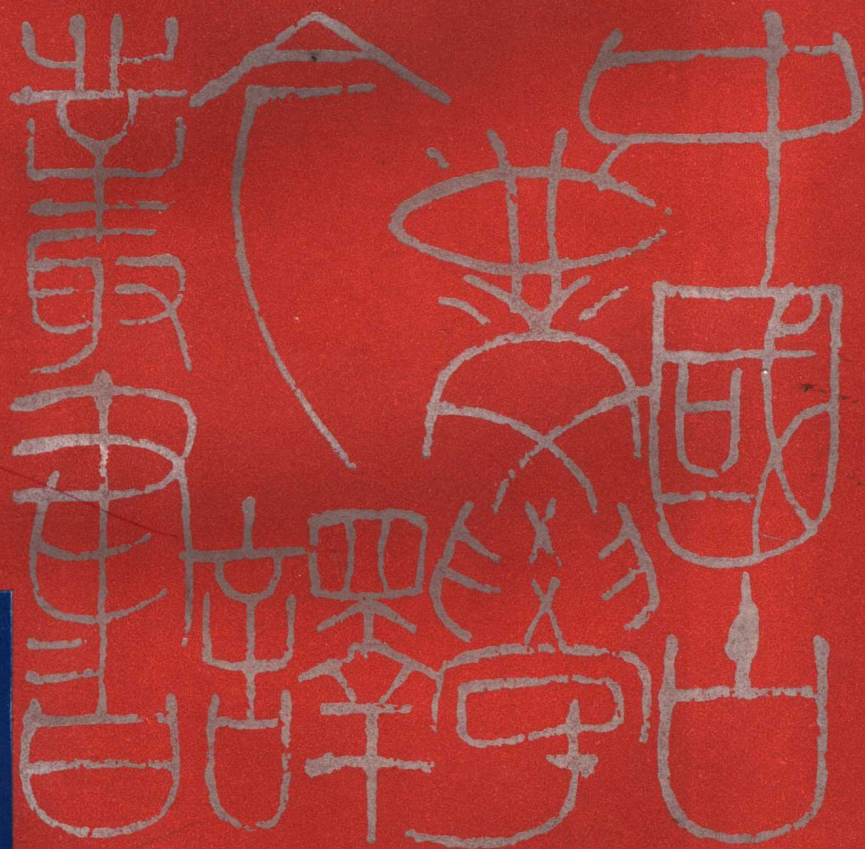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

王安石文选译

刘学锴 余恕诚 译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

王安石文选译

刘学锴 余恕诚 译注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安石文选译/(北宋)王安石著;刘学锴,余恕诚选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

(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

ISBN 7-02-002499-8

I.王… II.①王…②刘…③余… III.古典散文-作品集
中国-北宋时代 IV.I2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0451 号

封面设计:古 十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8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125 插页 2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5.00 元

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编辑说明

由于时代、生活、语言、文字的变化，今天一般读者阅读古代著作，存在有相当大的障碍，今译是克服这个障碍的重要方法。把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择要优先今译，既能满足读者的急需，又能推动今译事业的发展。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的计划，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制订的。

开卷有益、雅俗共赏是我们的编辑方针。有阅读一般报刊能力的城乡广大读者和中小学师生是今译丛书的主要读者对象。

丛书的题材和体裁力求多样化，既考虑作品的可读性，又注意扩大读者视野、陶冶情操，增进对伟大祖国的了解和热爱。

译文力求忠实、准确、流畅，与提纲挈领的前言或原文题旨说明以及深入浅出的注释相配合，使书中的各个部分结合成有机整体，以帮助读者对原作的深刻理解。

今译丛书不仅适宜于一般读者阅读欣赏，也可作为知识青年文化学习的自修读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五年五月

前言

北宋中叶政治革新家王安石，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作家。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虽然是他一生事业的两个不同方面，但都贯串着他那种强烈而执着地追求“有补于世”的精神，表现出远远超越世俗的思想见解。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家庭。二十岁以前曾跟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到过韶州、江宁(今江苏南京)、扬州、开封，以及今江西省境内许多地方。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签书淮南府(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判官。此后，一直到四十岁入朝任工部度支判官，中间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内，做过鄞县知县、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通判、群牧判官、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治所在今江苏南京)提点刑狱等职。由于王安石自幼好学，阅历丰富，有自比稷、契的远大志向，在历任地方官期间，又注意社会调查，作了一些兴利除弊的尝试，对造成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种种社会弊害渐渐有了较深的认识，并酝酿了整治的方案，遂于嘉祐三年(1058)，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针对北宋王朝“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形势，大胆提出全面革新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没有被仁宗采纳，但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影响。宋神宗即位不久，便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又接受王安石的建议，设立了“制置

三司条例司”，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相继施行，展开了有名的变法运动。这次变法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但由于触犯了豪绅大地主和富商大贾的利益，遭到代表他们政治要求的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加之当时吏治腐败，新法在通过官僚机构和一些投机分子推行过程中，实际效果与他的主观设想差距甚大。王安石自己也于熙宁七年、九年两度被迫罢相。后一次退休达十年之久。神宗去世后，新法很快便被全部废止，王安石忧愤而死。

作为一位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把文学创作活动和政治及社会教化密切联系起来，不止一次强调：“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上人书》）、“治教政令，圣人所谓文也。”（《上祖择之书》）他不满在北宋前期文坛上占有显赫地位的西昆派，批评他们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裴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摘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之根柢济用，则蔑如也。”（《上邵学士书》）从“求根柢济用”的角度批评西昆派是击中要害的，体现了王安石对于文章内容和社会功效的高度重视。“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这段话可以说是把有关文章的“根柢济用”，从正面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把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形式技巧比作器物上的刻镂绘画。而根据上面提到的他对文的认识，有“根柢”又能“济用”的内容，当然也不出乎适用性很强的“礼教治政”的范畴。这些见解，着它积极进步的方面，但又不

无偏狭之处。我们结合北宋古文运动产生的具体背景，并联系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和思想性格去理解，便会觉得它的出现是很自然的。

王安石在文章写作中，似乎比他在诗词创作方面更彻底地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他的文章众体兼备，而在各体中占着最突出地位的是政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被梁启超誉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王安石评传》）。《上时政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等篇，也同样是煌煌大文。这些奏章，揭露时弊，切中要害。分析事理，深刻透辟。从各个角度引出因循守旧将招致危亡的结论。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说明变法革新的迫切性。在封建时代，这种为革新造舆论的博大有力的文章，实在不多见。至于像《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答司马谏议书》、《与马运判书》、《答曾公立书》等，虽属记序、书信之类，而从内容看，则同样属于政论性和现实性很强的作品。《兴贤》、《材论》、《读孟尝君传》、《太古》、《伯夷》等是又一种议论性的文章。透过其中对世俗和某些传统之见的批驳，仍然可以看到它们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矫世变俗之意的。祭文和碑志一类在王安石集中达二百多篇。所谓“无体不备，无美不收，昌黎以外，一人而已”（梁启超《王安石评传》），形式风格是多样的。但从《祭欧阳文忠公文》、《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等篇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眼光总是较多地落在对方的行藏出处、政治大节上。即使是像《游褒禅山记》这样的游记，作者也不在模山范水上用力，而是从游览中悟出一番关于成就事业和学问的道理。因此王安石的文章题材体制虽然多样，却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礼教治政”存在着密切联系，体现出

“有补于世”的精神。

王安石文章的突出优点，是识见超卓，论析精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上时政疏》、《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等篇，固然很典型，其它一些文章，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很显著。《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在极简括地交代了厅壁题名之后，立即用“舍天下之众者财”等三句话，提出财、法、吏三方面的问题，又由财的重要和财、法、吏三者的相互关系，推出“善法择吏以理财”是国家的当务之急，进而提出三司副使应该为朝廷改革、完善理财之法，“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文章由很平常的厅壁题名，上升到变法的高度，论述得极有说服力。明代茅坤赞赏说：“何等识见，何等笔力！”《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写出墓主许平是一位“智谋功名之士”，欲有所为，又有贵人推荐，“然终不能一用其智能以卒”，似哀似慨，与一般碑铭已经大异其趣，而文中竟又提出另外一种“离世异俗”，“有所待而不悔”的士人，来与许平对照，暗示出“君子所以贵自守”（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的主旨，确如吴闿生所评，不仅“用笔诡变不测，极纵横跌宕之致”，而“托意尤高”。《答司马谏议书》一开始就绝对司马光攻击的回答，提到名实之辨的高度，使司马光这样以儒家忠实信徒自居的人陷于被动。接着针对所谓“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一一加以驳斥，清代吴汝纶以“劲悍廉厉无枝叶”评此文，而所以能做到“劲悍廉厉”，正由于作者站得高，说理极为斩截透辟。

王安石在文章方面推崇孟子和韩愈，但他的论说文不像孟、韩那样追求气势。即使是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类规模宏大、议论风生的长篇，也主要以警策透辟和善于布局谋篇

见称。他的短篇则以简劲取胜。刘熙载曾指出：“介甫文兼似荀(子)、扬(雄)。荀，好为其矫；扬，好为其难。”(《艺概·文概》)应该说是确有所见。矫，指卓然不群；难，指思考之深。王安石对于柳宗元的文章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柳文“探原立论，核覈刻深”(刘师培《论文杂记》)，跟王文有相近之处。由于见解高，思辨深，再加上他那刚毅果断的个性，王安石写文章似乎不屑于平直周详地讲浅俗的道理。某些传统和世俗之见，只要他认为是不妥的，决不姑息、迁就。所谓“下愚及中人之所见，皆剥去不用”(刘熙载《艺概·文概》)，这样，他的文章便显得立论极高极严，人取我弃，剥尽肤庸，悍厉绝伦。除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等少数陈述政见的文章，条分缕析，尽言极论外，一般的文章，在别人需要委曲周详地用许多话去说的道理，他往往只用一两句话就概括无遗，所谓“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无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而段与段之间，一层意思与另一层意思之间，又往往不用过渡承接的文字。如《书李文公集后》，前一段说所恶，后一段说所好，对此作者没有作任何说明或提示。文章几层意思之间，也没有过渡性的文字。完全是陡起陡接陡转。又如《读孟尝君传》一开头就陡然提出“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下面“嗟乎”句、“不然”句、“夫鸡鸣狗盗”句都是硬接硬转。由于立意高，让人有高峰矗天之感，又由于用笔不平直，文势如峭壁悬崖，所以王文便形成一种健拔峻峭的风格。王安石和他同时代的散文家欧阳修、苏轼虽然都尊韩，但欧文发扬了韩愈倡导的文从字顺的精神，平易舒缓；苏轼把韩文的气与其才情、学识相结合，议论文多半纵横捭阖，汪洋恣肆；而王安石则本其性分之所近，吸取

和发展了韩文遒劲拗折之长。可能由于王安石过分强调适用,对文学艺术多方面的功能和艺术形式的作用重视不够。他虽然在《祭欧阳文忠公文》等篇中,表现了很高的酝酿气氛,以及用声情词采润饰文章的能力;虽然在晚年的一些小诗中,可以看出他有很强的摄取和表现自然景物的能力,但王安石的抒情写景之作,在文中毕竟很少。其它类型的文章,对形象性和生动性也注意得不够。他的偏于严峻的气质,在文中似乎妨碍了这一方面的发展。这也许可以说是王安石在散文创作方面的不足。不过,总的说来,王安石的文章思想进步,识见卓越,概括力和逻辑性极强,那种“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吴闿生评语。转引自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在唐宋八大家中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他崛起在北宋中叶的文坛上,与欧阳修、苏轼等大家并列,而又戛戛独造,对发展和丰富祖国散文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本小册子选了王安石各类文章中比较易懂而又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二十四篇,原文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五九年版《临川先生文集》为底本,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王文公文集》(龙舒本)进行了校勘。每篇除附有简要的说明和注释外,用现代汉语进行了翻译。因为所选文章除少数几篇外,其余都不能考知作年,因此排列次序仍然依照《临川先生文集》,不再将编年与不编年的作品分开编排。

由于我们对原文理解不够深透,文字又很笨拙,许多地方都感到远远不能把原文的内涵圆满地表达出来,希望读者能把更多的力量用在研读原文上,并对译文中的不妥之处给予指正。

目 录

前言	1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1
上时政疏	46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51
伯夷	59
材论	63
太古	68
兴贤	70
知人	73
伤仲永	75
同学一首别子固	77
读孟尝君传	79
书李文公集后	81
答司马谏议书	84
答曾公立书	87
答曾子固书	90
与马运判书	93
答姚辟书	95
上田正言书	97

上人书	102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104
游褒禅山记	108
祭曾博士易占文	111
祭欧阳文忠公文	113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116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本篇作于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是作者集中论述变法的关键问题——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拔和任用问题的奏章,也是作者关于变法的纲领性文章,题一作《上皇帝万言书》。

文章首先尖锐揭示北宋王朝内外交困、财穷俗衰的深重危机,指出其原因在于“不知法度”,从而提出根据“所遭之变,所遇之势……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因时改革的纲领,并明确指出,当前要进行变法,“其势必不能”,原因在于人才严重缺乏;而人才之所以缺乏,又由于“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下面就紧紧围绕人才的陶冶成就选拔任用之道,从正反两个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本文集中阐述人才问题,对于变法的必要性与具体内容较少正面涉及。这是因为,作者认为人才问题是变法的前提与关键,人才危机是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在论述过程中,对当时财政经济、国防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題也都有所论及。如针对官冗财乏之说,作者便正面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样一条以发展生产为根本的理财方针。实际上,后来他所实行的以理财、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变法措施,在这篇论文中已有所反映。

此文揭露时弊，切中要害；分析事理，深刻详辟，既有严谨的结构和严密的逻辑，又有磅礴的气势和挥洒的笔力，近代文豪梁启超在《王安石评传》中，就赞誉“此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一〕}，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二〕}，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惴惴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四〕}。”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

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五〕}，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三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为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合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

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一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六〕}”，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七〕}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免置之人，犹莫不好德，《免置》之诗是也^{〔八〕}。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九〕}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一〇〕}，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

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一〕}。故诗人叹之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二〕}盖闵人才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三〕}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四〕}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五〕}，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